



# 人間正道是滄桑



张亦工文集

**谨以此书  
献给在我们家庭最艰难时期  
给予帮助和支持的亲朋好友们**



致所有亲戚朋友们：

余自2002年元月14日发现肿瘤，此后历经手术、化疗、放疗，先后治疗休息多时，至今已经一年有余。去年12月中旬，王岚亦因余之患病抑郁成疾，种种不幸出人意料。诸亲友为救治我们夫妇，各尽其责，遂使我们有适当的治疗和休养生息。鉴于此种疾病之救治甚为困难，我们夫妇商定，全力以赴努力治疗，决不轻言放弃，决不辜负诸多亲友的关爱。

去年初以来系余家至为不幸，艰难困苦之特殊时期，我们夫妇先后罹难，呜乎哀哉，夫复何言。值此不幸时期，正是诸多亲友的关怀帮助，才使我们能够坚定乐观豁达的生活态度，这是我们对抗疾病的重要力量源泉。由此益感亲情友情于人生有特别重要之意义，亲情友情才是人生最值得珍惜的内容，此种认识，非有特别不幸之际遇，实难深入体会。

所有在我们家庭处于最艰难困苦时期关心和支持过我们的亲戚朋友，都值得我们永远记忆和感谢。

张亦工

2003年2月12日



蘭草蘭草到秋空之空  
宛新霜落空路似道落葉不  
識晚秋秋晚秋晚日暮鴻  
飛之畔

湘齊

遺字不四三

為當方之秋出差到天津

當付心与風之相忠所以有此  
作此亦之秋初到冬之八厂即利  
食差做勉善矣其時風之正正合空  
却厨所以相識何之者考命考如食  
差之去案祖之作知道有美湘齊哉在  
不學情次之內息有控勝哉有新涼意  
此解信任和关心令我大为感动是为忠君  
之重會是也所臨之秋風之悲已不多记忆

1972年秋出差到天津遥寄凤兰

三年甘苦铸成同心 离别情绪入  
还韵琴杯 高歌慷慨 悲辛  
天涯万里 同葆青春 相约后会  
再往与今 十年浩劫 朝新人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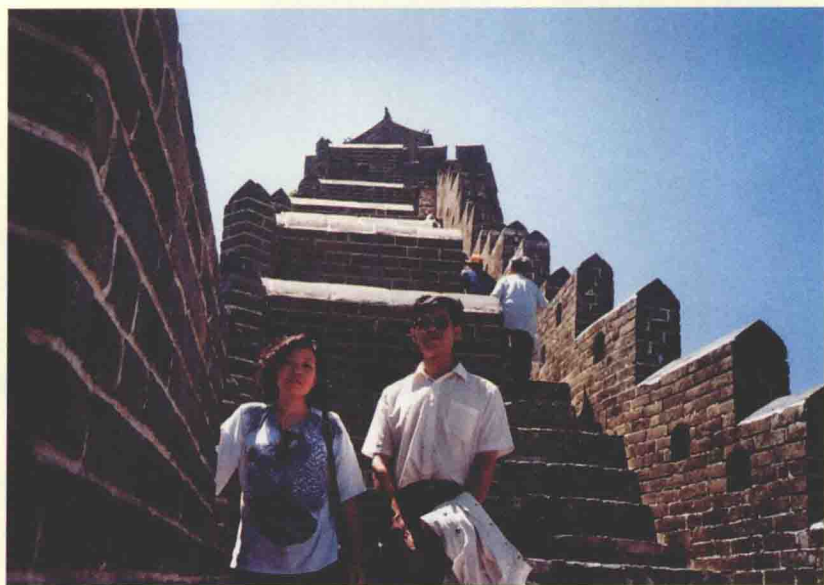
一九六八年夏秋之际 大专班同学  
毕业离校 依此词学意 寄舍友

戮刃当时 军国险工 宜队 伟德 德  
偏信 戮战的 依此 词学 地外 庄制  
同浩 愤不平 敢为 慷慨 情绪  
当时 同学 力有 好诗 词者 贡献  
良为 我者 苦思 一单 赋改 词三  
诗 强 建 平 元 代 为 颂 读 各 同 学  
同 此 感 慨 何 冬 松 兄 逆 路 此 谱 曲  
格 调 古 横 伟 焉 一 时

1968年夏秋之际为大专班同学毕业离校送行









# 序一

## 犹记侠肝义胆

——清明怀亦工

丁伟志

又到清明，免不得为习俗牵情，怀念起那些先后辞世的至爱亲朋，特别是那些心灵相通、志同道合、曾经长期共事过的师友们。虽然他们已化作缕缕青烟，飘逝得无影无踪，但是他们的音容笑貌依旧栩栩如生地不时展现在我的眼前和梦中，让我觉得温馨，让我觉得不是孤独地、而是和那么多的好人相伴着走过了人生旅程。

随着自己的衰老，值得纪念的亡友自然也越来越多得不可胜数了，这里只挑出一位可以算得上是忘年之交的张亦工同志，来诉说一点对他英年早逝的惋惜之情。

2003年的春天，SARS肆虐的时节，我经历了难以言说的悲痛折磨。不到三个月里，先是意气投合的两位老友相继辞世，紧接着是老妻病故。正是在我接连受到打击，精神濒临崩溃的时候，传来了亦工去世的消息，而且仅仅过了几个月亦工的夫人王岚竟然也患与亦工相同的病去世，给所有认识他们的人，带来了无比的惊诧和悲伤。亦工的英年早逝，给我们这些老家伙们，带来了另类打击，让我们陷入了“白发人送黑发人”的怨天尤人中。原本在我们这批二十年前曾经为之投入心血的《中国社会科学》和《历史研究》的老编辑们眼里，亦工以及和他年龄相近的几位年轻编辑，正是继续支撑起那项事业的顶梁柱。正像接力跑

一样，亦工从我们手里接过了接力棒，可是想不到他才跑到半途竟猝然倒下。

回忆当年初识亦工，时在上世纪70年代末。见到他的第一印象就是：好一条铁打的汉子！又高，又黑，又瘦，风尘仆仆，腰板挺直。那时就觉得，鲁迅写的治水的大禹，就该是这般硬汉的模样。我初见他就觉得投缘，当然主要还是由于他考取了黎澍同志的研究生，而他的唯一同窗又是我们的老友张枏同志的儿子王好立。那时他们二人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第一批硕士研究生，可是他们每周都要到我们杂志社师从李玉贞同志补习俄语。每当看到他们英姿勃发、勤恳好学的身影，真叫人觉得我们国家历经劫难摧残的社会科学事业，又有了振兴的希望。

社科院第一届研究生毕业，亦工便分配到我所在的《中国社会科学》杂志社工作，可是，他还没有正式上班，就进了医院。当时我还代表社领导，到小西天的医院里去探视过他。我很纳闷，看去这样好的身子骨，怎么会突然病倒？他倒坦然，反过来安慰我们，说自己没大问题。果然没多久他也就康复出院，正式上班，担当起中国近代史方面的编辑工作。如今回想起来，当年医生和我们大概都对他的病掉以轻心了；只看着他外在的军人般的硬朗形象，忽视了他身体内部潜存的危险病灶。当然他满不在乎，高高兴兴地做起了被有人看作“吃力不讨好”的编辑业务。

亦工出身革命家庭，他继承了艰苦朴素、埋头实干的优良作风，而没有沾染时下颇为常见的公子哥式的骄横纨绔习气。从参加编辑工作之始，他就以明朗的态度坚定地站在拥护改革开放，拥护解放思想，卫护学术自由的立场上。每遇重大分歧时，他是非分明，言行举止渗透着一派侠肝义胆的豪情。但是亦工素来不事张扬，他把信念体现在身体力行的默默奉献中。当着评职称、分房子这些涉及到人们切身利益的关口，有人在力争，亦工却是在退让。坦然地把好处让给别人，心平气和、无怨无悔。如此行止，如果没有为他人着想、为大局着想的宽阔胸襟，恐怕是难以做到的。别人厌烦的繁杂事务，亦工能

够将它揽过来，承担起琐细的具体事务。上世纪90年代由他发起的关于民国时期剪报资料的编辑、编选、出版一事，从策划、组织、筹措经费，与藏书单位达成合作协议，到吁请胡绳、孙起孟先生出任顾问，寻求日本友人的支持诸事，都是他一个人具体操办的。至于我和徐宗勉同志，被他动员参与发起此事，实际上也只能是发发议论，帮着出些并不一定能用上的点子而已。我们毕竟精力不济了，这一项目的组织实施只能靠他来支撑。正是为着创造条件完成这项颇为耗资耗力的工作，经亦工的奔走，在日本友人卫藤沈吉先生和旅日学者李廷江先生的鼎力协助下，1998年4月，我们一行四人受日本国立图书馆馆长的邀请，赴日作一周的学术访问。亦工是我们这次学术访问的实际组织者，他细致地安排了活动日程以及商谈的一切细节。这次访问是愉快的成功的，最大的成果当然是我们筹划的民国剪报汇编项目终于可以顺利启动。看来条件已经具备，下边的事就是组织人力，抓紧施工。回国以后，我们便把这项工作全部委托给亦工负责去做，我和宗勉便歇在一旁静候其成了。

此后的两三年间，过上些日子，亦工便会向我们通告一番工作进展的情况，看来困难虽有，但仍能按部就班地做下去，成果可期。出乎意料的是，突然传来消息，亦工这样一条铁铮铮的汉子，竟被恶疾击倒了。我们无不为此焦虑万分。可是当时我正陷于老妻病危的困境中，抽不出身去医院看望他，只好拜托朋友们代为慰问，祝愿他早日康复，也相信他能早日康复。那年年底，我应邀出席了社科院举行的一次颁奖会，居然看到亦工代表《历史研究》登台领奖，不由喜出望外，赶忙在会议的间歇里找到他询问近来身体情况，他乐观地笑着回答说，一周内已经可以去上几次班了。精神状态，一点也不减往年。万万没有料到，2003年5月底，亦工病情再次转危，迅即告别人世。这离我的妻子陈崧去世还不到一个月，伤心事竟然赶到了一起。五年前访日的人，转瞬间走了一半，真让人痛彻肝肺。

亦工一走，我们那个项目，也因群龙无首，陷于功败垂成的尴尬之局。顶梁柱倒了，大厦能不倾塌吗！我们已经没有力气再把大厦支撑起

人间正道是沧桑

来，只剩下徒呼奈何。在痛感个人无力回天之际，我只能眼巴巴地企盼着不久的将来，会有比亦工更年轻的历史学者，把亦工的未竟事业承担起来，做出更新更好的成果。

2006年4月清明节于北京东郊寓所



## 序二

### 怀念亦工

徐宗勉

亦工为《历史研究》杂志，为史学事业辛勤工作了二十多年，他原是个很肯干事的人，却在最能干事的年龄走了，留下许多遗憾。作为与他相知多年而又比他大十四岁的老同事、老朋友，我对他的过早去世尤感悲痛和惋惜。

我第一次见到亦工，是1981年春季的一天在积水潭医院病房里。当时医生给我做了一个小手术，出院那天来接我的不是我的老伴，而是一个高高瘦瘦约摸三十来岁的年轻人。经他自我介绍，才知道他名张亦工，是黎澍同志的研究生，刚分配来我们杂志社工作。他见我的老伴近两天身体不适，便主动提出由他来接我出院。这件事给我的感觉是这个人有点特别。根据我的经验，在文化学术部门工作的知识分子，包括一些刚出校门的大学生，大都不愿去做纯事务性的事。亦工当时已获硕士学位，而硕士那时尚属凤毛麟角，加上他已过而立之年，却主动揽来这件堪称琐屑的差事，这表明他乐于助人，又不嫌弃做小事。

后来相处时间长了，才知道亦工不仅是乐于助人，肯做小事，还很爱做实事，兴办事业。他不尚空谈，作风朴实，思维周密而具体，做起事来一步一个脚印，非常有韧劲，同那种只会写文章，不愿做也不会做实事的知识分子迥然不同。

就在亦工调来后的几年里，杂志社上上下下都怀有一个愿望，即在

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，办一点既有社会效益，又有经济效益的事业，一是为了创收，以改善大家的生活；二是为了让大家多一个发挥、锻炼才能的机会。对此全社同仁虽无不期盼，但杂志社是“清水衙门”，一无资金，二无多余的房屋，要办成这样的事谈何容易，因之自愿出来担此重任的人并不多，而社领导一时也拿不出可行的方案来。就在这种情况下，亦工等二三同志决定创办一种普及历史知识的刊物，名《历史人物》，认为这样的刊物既有益于文化建设，又会为众多读者所欢迎，可作为一项事业来办。他们从1984年底开始，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，争取到黎澍、李新、雷洁琼、端木蕻良、启功等著名前辈学者的支持，先后编齐了两辑稿件，却因种种与刊物内容无关的原因，申请不到刊号，最后只得以内部印行的方式将这些稿件合印一册与读者见面，这已是1986年12月的事了。两年中的经历，亦工在为这本《历史人物》写的《编后语》中有简要的诉述：

“这一年多的时间里，我们曾经带着第一辑的清样，努力争取每一个出版的机会。所有看到清样的人，不论是专家学者还是普通的各界读者，不论是出版单位的负责人还是主管出版事业的政府部门的工作人员，无不认为《历史人物》是一本有益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事业的读物，遗憾的是人人都爱莫能助，《历史人物》终于不能作为正式出版物与读者见面。”“我们不想再迁延，许多读者也不能再等待，《历史人物》只能两辑合成一册，内部出版，以飨读者……由此造成经济损失，也只能在所不计……”

从上述诉说中可以想见，亦工和他的同志们为创办这本杂志付出了多少艰辛，遭遇多少挫折，作出了多大的自我牺牲。记得我曾问过他：你这样热心于办事业，还哪有时间搞科研呢？出不了研究成果，会影响评高级职称的，你想过吗？他的回答很简单：科研以后可以搞，当务之急是要把社里的事业办起来，个人评职称推后一点没关系。

正是通过这些事实，我进一步看到了亦工不仅热心公益，不计较私利，而且有一种面向现实，重视实际的精神。这种精神也体现在他的学术研究和学术活动中。



关于亦工编辑《历史研究》包括担任主编的情况，我了解得不够全面，就不说它了。这里只讲一讲他的学术工作的一些情况。

亦工在大学学的是工科，毕业时正值“文革”时期，被分配到工厂当工人，所学专业一点未用上，倒偷着读了不少文史方面的书籍。“文革”结束后，他弃工从文，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，从黎澍治中国近代史，属我院首届研究生，他的硕士论文讲的既不是有关反帝反封建斗争的“主旋律”，也不是对一事一人的微观考证，而是《第一届国会的建立及阶级结构》。它可以说是一项需要大量事实材料包括统计数字，而又有着深刻的历史内涵的研究。这位刚刚跨进史学门槛的研究者，首先就选择这样的题目来做文章，表明他最关注的是中国近代的民主问题。

为什么会关注历史上的民主问题？就是因为他非常关注现实中的民主建设问题。关心当前的政治民主化建设的人即使在史学界也并不少，但因此而去探究历史上的民主问题的在当时却并不多。其实，历史与现实是相通的，研究昨天才能更深地认识今天。

记得在1986年后的几年里，亦工和我，有时还有《历史研究》编辑部的其他人，经常在一起议论当前改革政治体制，建设民主政治的问题，这本是当时人们的热门话题。不同的是，我们的议论往往联系到中国近代历史上的相关现象，并进而认为对近代历史上的民主问题很需要做专门的研究，这对今天的中国政治民主化有很大的认识价值。我们的议论的结果是决定一起来进行以“近代中国民主化进程”为课题的系统研究。虽然我自1950年代后期就关注中国的民主问题，并在“文革”结束后着手考察近代中国的民主思潮，但如果没有亦工的积极参与，我是很难下决心来做这个课题的，因为那时可供此项研究利用的现有成果很少，再说我们的本职工作很忙，只能在业余做研究，做起来难度是相当大的。

有了决心，困难也就挡不住了。经过努力，这项研究于1990年获准列为国家社科基金课题。课题组共有5人，亦工负担的工作最多。他不仅分担较多的书稿任务，还主持组里的事务工作，加上1992年后